

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再思考

肖 刚 李 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广州 510420)

[关键词] 东南亚外交; 国际环境; 金融海啸

[摘要] 在 21 世纪的中国地缘外交中, 处于首要地位的应该是东南亚外交。只有中国和东南亚整体关系达到高度稳定和高度互信的状态, 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才会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今天, 内政中有外交, 外交中有内政的观点已为世人所公认, 而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证明, 传统意义上的内政和外交的边界更加模糊化。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大国合作趋势, 有可能使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战略失去效用, 中国应该积极地推动大国关系与东南亚关系的和谐双赢。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 东亚大国和东南亚之间只有建立完全平等、互不从属基础上的合作, 才能使东亚一体化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图分类号] D822.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9)03-0050-07

Rethinking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Xiao Gang & Li Liang

(School of Legal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Keywords Diploma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Abstract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should be the key to its geopolitical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Only as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oes remain more stable and more mutual trustful,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will be fully secured. Today, it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 traditional domestic affairs from foreign policy, which is also proven by the relation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as a resul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can make Southeast Asian equilibrium strategy among big countries less effective, so China should catch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win-win foreign policy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s of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should establish completely equal and non-subordinative cooperation, so as to make the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 develop healthily and actively.

一 引 言

国际政治常常是需要用逆向思维才能真正地理解其内在本质的。比如在二战结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与东南亚的关系却相当不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我们自身而言, 按照现代外交方式和世界打交道, 中国尚缺乏经验。中国在和世界交往, 特别是和东南亚国家交往时, 曾经使用完全出于善意但客观效果不好的意识形态手段等不恰当的方式, 引起了东南亚国

家对中国的诸多误解。就外部因素而言, 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本来就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独立与崛起, 把中国广大的邻国作为遏制新中国的工具, 破坏中国和邻国的关系成为他们的核心任务, 新中国现代外交的短暂的“茫然”也就为外部仇华势力挑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机会。

今天, 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剧变和重组、中国综合实力增强的前提下,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同时, 随着中国现代外交经验的积累和外交政策方向的调整, 中国

*[收稿日期] 2009-04-01

[作者简介] 肖刚, 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李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2007 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先进性研究”(批准号: 05BKS007) 的阶段成果。

似乎找到了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之道。正如关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人士所指出的,“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东南亚看到了与中国改善和发展互利合作关系的必要性。虽然在开始阶段有所顾虑和彷徨,但对现实利益的重视和追求,使东盟国家外交战略家的视线逐步由西方转向中国。”^[1]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与东南亚建立起了复合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由于东亚区域外大国如美国的破坏性制衡和某些东亚大国如日本的破坏性干扰,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还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能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还远未达到紧密的相互依存的程度。由于东南亚国家大多为小国,其生存与发展很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左右。比如,西方国家反复向东南亚国家灌输“中国威胁论”,东南亚国家对此往往宁可信其有,从而导致形成中国对东南亚真心倚重,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无端恐惧的不对称关系。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发生传统安全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就必须加大各种资源的投入,使潜在的不稳定和冲突性的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如果对自身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与安全问题都未能解决好,中国也就无法走出地区性大国的窠臼,甚至可能会因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而造成内部混乱和国家分裂,从而导致未盛而衰的悲剧性结局。

中国只有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去建构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才能把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与中国相互依存度最直接和最紧密的东南亚地区建设成为确立中国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地缘政治核心支柱。

二 把东南亚外交摆在中国地缘外交战略之首

为什么要将东南亚外交摆在中国地缘外交战略之首?首先是出于整合、优化中国与东南亚安全关系之需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冷战的结束和‘9·11’事件的发生,都未能成为南亚(主要是印度)甚至东南亚,或东亚(主要是中国)安全关系改变之动力,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量的积累,还未能实现革命性的突变。”^[2]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的安全关系构建最为成功,北美的安全关系也优于亚洲,亚洲充其量好于非洲和阿拉伯地区。欧洲和北美安全关系的构建之所以比较成功,最主要是因为大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主导作用。第二,调整中国地缘政治战略重点的需要。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基本上采取的是全方位外交战略,既重视亚洲外交,也重视欧洲外交,同时非洲外交也

是重点。所有这些外交举措,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全方位外交也暴露了一些缺陷和矛盾。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虽然大为改善,但尚未达到质的飞跃。东南亚总体上还是把权重放在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上,也就是说,东南亚在高端政治上更加依靠美国而不是中国。亚洲的一些学者也认为:“随着美国以乐于助人式的方式(accommodative involvement)参与到东南亚事务之中,即使中国在东南亚颐指气使,旁若无人,东南亚国家的地区主义也将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其受益的范围不再只限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保障海事安全方面,而将广泛得多。”^[3]据说,“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力量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下降趋势”,他们“期待美国能够防止中国在本地区的任何实质性扩张”,否则,“一个势不可挡的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就更加可能了”,在那种情况下,“东南亚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后院出现‘大中国’之局面”^[4]。第三,与中国谈得上真正友好的东南亚国家不多,缅甸虽算得上是一个,但中缅关系也是西方国家最“关注”和最想分化的双边关系。中国常常因缅甸内政的所谓“制裁”和“独裁”而受到西方国家的指责,他们以冷战思维完全没有根据地揣测中缅关系对印度所谓的地缘政治威胁等。比如美国军方学者劳伦斯·格伦特(Lawrence E. Grinter)就说:“北京的广泛安排及其与仰光、河内的政治、安全、经济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特别重要。缅甸的动荡、腐败和不良发展检验着北京的耐心和中共和的机敏度。……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在等待澄清中国崛起之长期含义。”^[5]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大卫·史腾柏格(David I. Steinberg)也说:“中国在缅甸显然存在强烈的地缘政治利益,因为缅甸能够提供给中国进入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并经由缅甸到中国西南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而中国西南省区生产商品则大量涌入缅甸。印度尽管对中国表现很友好,但也把崛起的中国与巴基斯坦、缅甸的联盟视为潜在威胁。为了从侧翼有效包抄新德里,中国通过对缅甸洪水般军事和经济援助、投资及数量巨大的非法移民,似乎已经达到包围脆弱的印度之目的。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入到缅甸的信贷和财富领域,有人估计,曼德勒市以北的腊戍市,50%成了中国云南人的天下。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指出,曼德勒市本身是缅甸文化的重镇,其人口的20%来自云南。”^[6]美国学者唐纳德·柏林(Donald L. Berlin)也断言中缅的紧密关系对印度的生存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说:“中国在缅甸

修路、搞军事设施建设,以及牢固的军事关系、在安达曼海的中国情报设施的存在可能,所有这些都给印度带来了极大的麻烦。”^[7]很明显,紧密和友好的中缅关系对某些西方学者来说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是他们必须想方设法拔掉的,非如此不能解他们心头之恨。

中国的地缘政治包括欧洲战略、非洲战略、美洲战略等,何者应优先?笔者认为把东南亚战略放在最优先地位的时候到了。中国应该努力追求东南亚国家以互信为基础的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和同步性,努力追求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所谓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是不但在经济上建立紧密、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军事和国防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也建立起平等且相互信任的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笔者注)。在东盟 10 国中,对华政策导向差异较大。现任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亚太安全中心研究员的丹尼·罗伊(Denny Roy)曾经分析认为:“东盟作为一个组织,使用两个保护他们自身的基本战略,以对抗强大的中国的支配:接触和防范(engagement and hedging)。防范包括维持与美国适度的防务合作,这可以称为平衡中国的低强度平衡。菲律宾和新加坡是公开表示这样做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则更加滑头、老道地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缅甸没有选择,只能与中国合作,本地区其他搭‘中国彩车’(bandwagons)的国家,只是和中国做生意。”^[8]从近 10 年来的情况可以看出,菲律宾和中国的冲突最为频繁,而中国和缅甸的关系最为稳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与中国保持比较正常的关系,但也时有一些冲突。即使是中缅关系,也存在很大的隐忧,西方国家一直在想方设法利用之。这种情形如果向坏的方向发展,必然会使中国的周边环境陷入困境,因此有必要对此加大外交资源的投入。一方面,努力巩固中国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另一方面,集中解决中国和菲律宾、新加坡之间阻碍双边关系良好发展的高端政治难题,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潜在的爆发性问题得到解决,使中菲关系向前迈进一步。总的来说,即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达到政治和经济上比较紧密的相互依存的程度。

三 把内政问题视为外交问题

《管子·霸言》曰:“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其意思就是,邻国有事变,其相邻之国可以有所得,也可以有所失。可见中国古人已充分注意到了国家之间,特别是邻国之间“利”与“害”的高度相关性。中国传统的外

交思想之所以具有先进性,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外交和内政联系起来观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许多内政的问题实际上都已演变为外交问题。比如,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国不能对此说长道短,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权力因素和复杂的国际因素交织在一起,考虑主权问题必须联系国际因素,考虑国际因素也必须联系主权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和台湾三者的互动中,我们应该看到,东南亚不会公开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以挑战中国。这一点如台湾学者林德昌所说的,“东南亚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地区,因为东南亚在地缘政治上和中国大陆接近,东南亚国家倾向于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对台湾而言,要发展和东南亚的官方关系相当困难,因而,每当台北实施其与中国大陆和那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通信”(例如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经济援助)时,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总是为决策者们萦绕心中。”^[9]西方学者更是心怀叵测地推断:“中国拥有的绝对的规模、临近东南亚的地理位置、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东南亚在古代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东南亚富得流油的华人社区,这些因素都造成东南亚国家对中国重新支配本地区的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在当代第一次引起这种可能性:中国不久将具备施加其进程于东南亚地区所需的手段。东南亚一些观察家看到北京对台湾威胁使用武力,则会推测,可能未来中国会同样地针对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10]这种推测完全是别有用心和毫无根据的,但对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提醒。也就是说,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把东南亚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加以考虑是非常必要的。从海峡两岸目前的互动情势来看,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严重干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但如果万不得已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做好对东南亚国家的安抚工作,以避免东南亚国家出现如《墨子·非攻》所描述的“赵氏朝亡”、“我夕从之”的错误判断。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以非和平方式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不可能发展到对东南亚国家也动武。或者我们换个角度,也不能因为台海关系稳定下来,我们就可心对一些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采取强硬政策,因为这样可能会把稳定下来的台海关系又推回到不稳定状态。所以中国解决自身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都必须建立在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内政上的问题,它也会在外交上产生一系列的后果。

《易经·乾》告诉我们，“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中国古代先哲老子说过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是这个道理。今天，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内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问题，都成为国际争端潜在的冲突因素。按照我们的传统思维，中国在自己境内修建水利设施完全属于自己的内政范围，别国无权指指点点。但问题是，有些问题是直接和国际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理不行。比如，面对湄公河的开发问题，德国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和人口与经济的增长相反，中国的水资源正在变得稀有化，水的稀有和不均衡分配，会导致国际性影响。”^[11]时为哈佛大学博士生的亚历山大·李伯曼 (Alexander Liebman) 以中国在湄公河的“表现”为例，否定中国学者“和平崛起”理论的真实性和自己的“国内利益”，对中国来说，“国内利益处于得失攸关之核心地位”，中国拒绝签署合作协定和继续进行有损于湄公河下游的单边项目，他们从未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使河岸国家 (the riparian states) 受益。在这些零和问题上，中国并未像慈善霸权 (benevolent hegemony) 那样采取行动。中国“所谓的双赢安排完全不具有现实性”，“中国的行动和其所表达的高标准的思想并非是一回事，他们并非代表对未来的慈悲行为作出一个可信的承诺”，东南亚国家“完全无法指望中国会为和平崛起提供诸如无海盗海运通道或开放的贸易路线这样的公共产品”，甚至在“双赢”的问题上，“中国绝对不会对其自身过度强大而东南亚国家严重示弱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作出让步”，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将以其在这条河未来的表现为指示器 (indicator)，中国会如何表现她的“和平崛起”？在这些问题尚不显得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中国都不能兑现“和平崛起”，而在中国“人口继续增长，经济继续发展，大坝继续建设，水的短缺和争端只会进一步加剧”的未来，就更不可能做到了^[12]。其实，西方国家不少媒体对此所持的立场，和李伯曼非常相似^[13]。

由此可见，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在中国面对其邻国东南亚国家时，呈现出越来越模糊化的趋势。

四 改变现状的时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学会抓住难得的时机。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

“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这就是：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14]。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对时机的把握和科学分析，准确地抓住了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规律和决定性时刻。今天，国际金融海啸对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但这也是中国重新确立自己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的最佳时机。毛泽东也很重视客观的国际政治形势所产生的机遇，他曾经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满地说：“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15]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强大起来会提出改变现状的要求，因此在西方世界才有将中国引入西方国家构建的“国际体系”的姿态和把中国改造成成为西方国家认为听话的“利益攸关者”的思维，以防止中国成为现状的挑战者。而一旦中国对现状提出质疑，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之行为。美国乔治城大学资深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罗伯特·沙特 (Robert Sutter) 就说：“中国领导人日益信心十足地大步迈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国际舞台，而一些美国决策者和分析家没有采取重要、有效的行动加强其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影响。美国迫切要做的事情是，中国的崛起必须要沿着美国支持的、更加符合国际规则的建设性路径行事。”^[16]很明显，这不但是在“提醒”美国，也是在向东南亚国家发出信息，东南亚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安全必须把美国请进来，作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否则中国将快要“控制整个东南亚”，“东南亚人民将要受苦了”。他“提醒”东南亚人，中国进入到东南亚后，如果没有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加以规范”，中国将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中国”。中国清楚地了解世界上这种近乎铁板一块的对华政策趋向，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说默认了“中国必须老老实实维护现状”的要求。但是中国的温顺行为似乎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因为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改变西方所设计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一贯正确的神话，正是这个他们所认为的雷打不动的“国际规则”，导致了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虽然欲死守这个旧得已经失去效用的“国际规范”的力量仍然很强大，但是要求对此进行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快要形成燎原之势。新兴

发展中国家增大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机制中的发言权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毕竟，欧洲的一些小国在 MF 和世行的投票权长期高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国际规范”，不利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更无助于全球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走出来。更关键的是，这样一个旧秩序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和及时的改革，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所能发挥的政治和经济作用就很有有限，当然也会间接地对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东南亚国家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中国确定将东南亚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最核心区域加以投入，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就更加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另外，东南亚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在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处于明显的变弱之势。由于东南亚国家主要由小国所构成，它们的对外战略一般均醉心于大国之间的权力制衡，只有大国之间形成竞争态势，东南亚才有机可乘，从而达到利用大国矛盾，谋取自身利益之目的。正如美国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主任沙图·P·利米耶 (Satu P. Limaye) 所指出的，东南亚国家“欢迎确定的中美关系中的‘创造性紧张’，因为这有助于两个大国影响力的竞争，在这样的逻辑下，东南亚国家也欢迎另外的地区‘选手’如印度和日本对这个地区作出贡献”^[17]。大国战略平衡假设的前提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其旨在达到大国“鹬蚌”们相争、而东南亚“渔翁”得利之效果。

很长时间以来，大国之间在很多地区的利益确实是冲突性的，尤其在东南亚地区，所以东南亚国家的“不让某一个大国独占”东南亚的思维是有根据的。因为大国之间为获得东南亚的钟爱，会纷纷把资源投入到东南亚，谁出手大方，谁就会确立相对优势，这种竞争的结果是东南亚从大国手中取得倍增的利益，何乐而不为？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加强，大国之间的协调也在加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大国间协调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甚至提出由中美主导世界事务的“G-2”构想¹。但这一观点一出笼即遭到质疑：“如果只是单独地由华盛顿和北京面对世界问题，注定是要失败的。”^[18]全球义务确实不能由一两个大国说了算，中国也决不能一强大就和美国联合起来搞霸道，但这并不排除中美在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假如中美真的可以在重大核心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思想还能行

得通吗？很明显，无论中美两国能不能成为“G-2”，中美都会就诸多问题举行不定期会晤，磋商合作以解决两国之间甚至全球性的矛盾与摩擦问题，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东南亚利用中美矛盾，从中得到大国之间相互制衡所带来的好处了。奥巴马内阁重臣、国务卿希拉里最近一些关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的有针对性的表态很耐人寻味。她说：“作为亚洲社会的成员，中国是何等的重要和不可缺少！因此美国必须和中国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在过去经济增长的20年中，我们和中国的相互经济联系显而易见，在目前经济艰难的时期，面对一系列的从核安全到气候变化，再到传染病等等的全球挑战，美中两国更应该加强合作”，“现在有人相信，崛起的中国必然是敌人，正相反，我们相信美中两国能够从彼此的成功中受益并相互为对方的成功做出贡献，美中努力在共同关注的领域和共同的机遇中加强建设，这符合美国的利益。”^[19]从美国首席外交官的对华表态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随时都可以和美国磋商包括东南亚问题在内的全球事务，这样一来，东南亚依靠“大国平衡”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也就派不上用场了。

在大国因素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主要是军事和国防力量的演变。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问题，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肯定会使东南亚国家以及自命为东南亚安全和利益的保护者的美国大为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如果中国也将大国因素引入东南亚，就更为美国所担心。有西方学者曾经担心，“人们似乎确认了可能会形成‘莫斯科—北京’轴心的警示，这里有很明显的军事需求，俄罗斯似乎热心向中国供应其所需要之武器。另外，这些合作无疑将改变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台湾海峡区域中的关键利益，中国军事能力在关键地区哪怕是丝毫的升级，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以同样的方法回应都会增加额外的负担，如果中国的能力得以提高，战略环境就不再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将是相当棘手的问题。”^[20]今天看来，十多年前西方学者的看法虽然极其武断，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如果从恶性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自己的杀手锏，比如把俄罗斯因素引入东南亚，这样一来，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战略就成为东南亚的自虐行为。当然这和中国讲诚信、行王道的独立自主的和

¹ 布热津斯基说：“我们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两国集团 (G-2)。中美关系必须成为广泛的合作关系，就像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那样。因此，我们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应定期进行非正式会晤，就我们的双边关系乃至整个世界进行面对面的深层次讨论。所有这些都应在政治和哲学层面指向一个雄心勃勃的方向”，见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Jan. 14 2009, *Finance times*

平外交政策不相符,中国也绝对不会这样做,但中国要向东南亚国家说明不会这样做的理由,这是其一。其二,这也说明中国和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高端政治发展还相当有限。比如,中美防务外交虽也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合作水平还不高,交流也不稳定,并常常因美国的非理性行为而中断。但毕竟中美的防务外交在发展之中,而且考虑到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促进东南亚的更加繁荣与更加安全上,中美两国应该建立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更加高级和更加频繁的交流与合作。

五 尊重东盟的独特地位

《易经·乾》说,“亢龙有悔”,它提醒无论是人,还是国家,如果因为有些许的成功就骄傲自满,必然是要后悔的,今后肯定会遇到麻烦。《易经·谦》更对谦虚进行高度哲学化的论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美国软实力近年来处于急剧下降的趋势,正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杰弗瑞·威兹曼(Geoffrey Wiseman)撰文指出的,美国特别是自小布什时代以来,严重忽视了“武力只是作为最后的手段,透明度、持续的对话、多边主义、谦恭”等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外交文化^[21],可见“谦让”或者“谦恭”已经是为正反经验所证明了的国际政治中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文化。《道德经》第六十一章,以外交哲学的思维专门、精辟、形象、深刻地论述大国和小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借重的关系。它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这对理解今天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中国是大国,应该放下架子,这样天下才会像河流一样,汇集到中国宽广如大海的胸怀之中。如果大国无欲无求,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小国的信任,所以为大国者应该谦逊。同样,小国对大国谦让,大国也会真心地信赖小国。中国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际上和《道德经》的思想完全一致。无论用《道德经》的思想,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理解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都不可能得出代表东南亚的东盟能够领导中国或者中国作为大国要以强权政治的方式领导东南亚的结论,中国和东盟的地位完全平等,也和每一个单独的东南亚国家地位平等,而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处的哲学和道德基础都应该是在保证对方领土主权完整基础上的相互“谦让”和相互“尊重”。

在亚洲的一些学者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是很不谦虚的国家了。他们认为,“东南亚国家也许对日益独断专行的中国领导层(assertive Chinese leadership)已经感到很不舒服,而中国的不谦恭行为可能由如下几个方面构成:迫切要求在合作规范方面的改变、在进程设定方面的限制性立场、排除非亚洲国家参与的排他性手段。”^[22]目前,中国学术界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是大国、强国,东盟无权力领导东亚的一体化,能担当领导东亚一体化的力量非中国等东亚大国莫属。这作为学术观点,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作为国家正式的对外政策,那就成问题了。澳大利亚驻克罗地亚前大使尼尔·弗朗西斯(Neil Francis)也主张东盟领导东亚一体化。他说:“东亚国家需要本地区发展不依赖于美国参与的集体安全战略。谨慎的方式告诉我们,东亚国家需要利用最近开幕的东亚首脑会议发展一个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作为东亚联盟(East Asian Union)实现的第一步,确定强有力而有前瞻性的东盟领导才是符合实际的。东盟将与东亚首脑一起工作,但东盟要保持领导地位,就要防止东亚共同体被建设成为作为“东盟+3”之一的中国可能占优势,或者为16个东亚国家所控制,这种模式会使其中有些国家感到,这会引向一个不受欢迎的“西方”进程。东亚共同体能否出现,取决于东盟的领导能力是否充分体现出来。”^[23]应该承认,弗朗西斯的观点具有进步性,因为他明确否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对东亚事务的所谓领导地位,但是他认为东盟是领导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认可的。因为作为小国集团和小国联盟的东盟,要领导和带领大国,必将面临折足覆餗的尴尬局面。东盟无力承担领导责任而让其担当此不必要之重任,并不见得是对东盟各国负责任的表现。

笔者关于中国与东盟互为领导不能成立的观点,并不表示不尊重东盟独特的地位。东盟各国在不侵犯他国主权的前提下决定自己的事务时,中国应该给予完全的尊重,而且中国将永远不会将东南亚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来经营,中国永远尊重其任何正当的选择,不干涉东盟与别国打交道或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中国要努力适应“东盟+中国”机制的途径,也要努力寻求发展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坚持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但绝不谋求将其发展为控制东南亚的大国联盟。

六 结语

在中国的外交棋局中,东南亚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子,因为它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地缘政治区域。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接壤,政治、经

济、文化、安全的关联最为紧密,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把东南亚外交放在首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新中国60年来的东南亚外交一直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阻碍,当然建国后中国对现代外交适应过程中的经验不足,也使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政策缺少稳定性,一度还非常紧张(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总体上虽然在

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潜在的高级政治与安全方面的问题还很多。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东南亚遏制中国的能力将有所减弱,中国和东南亚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的客观形势在加强,甚至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强。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全方位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使21世纪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更加稳定。

【注 释】

- [1] 杜平:《东南亚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华人世界》2007年第2期。
- [2] Vinod K. Aggarwal M in Gyo Koq *Asia's New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Evolving Structures for Managing Trade, Financial, and Security*, Germany: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Press, Dec. 2007, p. 260
- [3] *Ibid.*, p. 209.
- [4]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1994, p. 65.
- [5] Lawrence E. Grin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Opportunism and the Limits of Powe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Dec. 2006, p. 458
- [6] David I. Steinbe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The Problem of Burma/Myanmar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ug. 2007, p. 223.
- [7] Donald L. Berlin, "Neglected no Longer",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Cambridge Sum. 2002, p. 31.
- [8] 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ug. 2005, p. 305.
- [9] Teh-Chang Lin, "State versus Market: Taiwan's Trade, Investment and Aid Polic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Post-Deng Perio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No. 2 Sep. 1999, p. 84.
- [10] Denny Roy,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ug. 2005, p. 318.
- [11] Timo Menniken "China's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pr. 2007, pp. 119-121.
- [12] Alexander Leiman, "Trickle-down Hegemony?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Dam Building on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ug. 2005, pp. 281-283.
- [13] Michael Vatikotis "China's Growing Clout Affects Smaller Neighbors", Jun. 16, 2004, *Wall Street Journal*. Ron Moreau and Richard Ernsberger Jr. "Strangling the Mekong: A

spate of dam building has stopped up Southeast Asia's mighty river and may threaten the livelihood of millions who live along its banks. Mar. 19, 2001, *Nawaweeek*; Melinda Liu, "Making the Trains Run", Mar. 19, 2001, *Nawaweeek*; Craig Simons, "Beware of Falling Ice: Asia's glaciers are melting at an alarming rate, creating a hos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rom flooding to disease." Jun. 6, 2005, *Nawaweeek*; Michael Klare, "Wars For Water", Apr. 16, 2007, *Nawaweeek*; "The Mekong Dammed if you don't", Nov. 18, 1995, *The Economist*.

[14]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6-27页。

[15] 《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2页。

[16] Robert Sutter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The Dragon Looks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Book review)",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Dec. 2007, p. 528.

[17] Satu P. Limaye, "United States-ASEAN Relations on ASEAN's Fortieth Anniversary: A Glass Half Full",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Dec. 2007, p. 456.

[18] Elizabeth C. Economy,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May/June 2009, Vol. 88, Iss. 3, p. 14.

[19] Hillary Rodham Clinton, "U. S.-Asia Relations 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Remarks at the Asia Society*, New York, Feb. 13, 2009,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m/2009a/02/117333.htm>

[20] Gamett Sherman "Slow Dance: The Evolution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6/1997, p. 33.

[21] Geoffrey Wiseman "Pax Americana: Bumping into Diplomat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Vol. 6, No. 4, Nov. 2005, p. 409.

[22] 同 [2]。

[23] Neil Francis, "For An East Asian Un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Cambridge Fall 2006, p. 77.

【责任编辑:吴宏娟】